

南北进抉择与对华战略

1. 总体战体制与太平洋战争

国内危机与总体战体制强化

日军 1938 年公布实施总动员法,对各方面的反战力量实施了更为严厉的镇压。逮捕东大教授大内兵卫和有泽广己,禁止出版自由主义者河合荣治郎的著作并将其撤职,1939 年对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以“大逆思想”罪名进行审讯,判处监禁。而巨大的战争消耗和日见浓厚的败战感,继续加剧日本国内危机,形成了上层集团的巨大分歧,内阁更迭频繁。1939 年 1 月第一次近卫内阁下台,连续更替了平沼、阿部、米内等三届内阁,每届平均不过半年左右。日本为完成战争,不得不继续加强镇压,追求新的专制和集权,并进一步强化总体战体制。

对斋藤隆夫“反军演说”的镇压事件,为日军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一个契机。1940 年 2 月 2 日在第 75 届议会会议上,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发表演说,对政府追加临时军费预算等措施提出全面批评,内容集中于 4 点:1. 继续以近卫声明作为处理中国问题确定

不移的方针是否合适；2. 现在成立的汪政权没有统治中国的实力；3. 日本能否同时进行援助新政府和讨伐重庆值得怀疑；4. 国民为事变付出了巨大牺牲，而软弱无能的政府仍要求国民振作精神继续付出牺牲。^① 斋藤演说并未直接攻击军部，但军部仍冠以“反军演说”，指责其对战争“第一线将士的士气产生恶劣影响”，“冒渎了圣战的本义”，撤销斋藤以及议会中持相同观点议员的议员资格。新党运动又推展开来，议会中的法西斯右翼成立“贯彻圣战议员联盟”，主张“举国一致、向着完成国策前进”，解散一切政党，建立一个大的新党。各政党终于先后解散。8月23日成立了新体制准备会，10月12日成立“大政翼赞会”，进一步消除了政党的残存势力，强化了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在“一亿一心”、“一亿总动员”的口号之下，为总体战体制的最后完成作政治上的准备。在城乡各地组织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组织，对全体国民加强控制，同时还作为配给日用生活品的配给组织。对各生产单位也强化了组织控制，原有工会被迫完全解散。作为翼赞会外围组织而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领域成立了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1944年5月改称为农业报国会，此外还有商业报国会、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以及帝国在乡军人会，等等。这些组织将日本各阶层民众彻底地军事组织化，被捆绑在通向死亡和失败的战车之上。

战争所带来的直接冲击还在于经济领域。据统计自侵华战争全面升级之后，1937年军费为1936年的2倍多，以后平均每年递增70.36%；而1941年度直接军费达125.03亿日元，较1936年增长约10.5倍，占国民收入34.9%，占国家总预算75%。^② 巨大的军费开支必然削减生产投资，影响生产发展。仅1941年直接军

^① (日)林茂等：《日本内阁史录》4，第150页。

^② (日)1980年《防卫手册》，第432～433页。

费就接近于为完成4年生产扩充计划的总投资144亿元。该4年计划指标唯有机床一项完成,其余重要战略物资如钢材、纯碱、烧碱、船舶等甚至未能达到计划第一年度即1938年的生产指标。^①庞大的军费开支消耗了日本的黄金储备,据统计1938年日军用于对美英贸易结算黄金为388.2吨,黄金储备降至25吨。1939年至1941年,日本为扩大战争而抢购战略物资,至1941年12月,日本向美国累计支付黄金609吨,黄金储备降到不足8吨。日本战史记载,日本的国家经济实力,特别是购买重要物资的购买力“于1938年度丧失回旋余地”。^②

日本驱使其国民充当炮灰,人员损耗甚重。日军总兵力自1937年107.7万人增长为1941年底的242万人。直接从事军工生产人员达200万,导致日本男性劳力锐减,连煤矿井下作业、码头搬运等重体力劳动,也要妇女劳力担任。军部还在1939年11月3日下达命令,破例批准驻本土军队中的农村出身的士兵放农忙假,回乡收割稻谷。出自对兵员及劳力的需求,1941年1月22日日本政府通过《人口政策纲要》,将法定婚龄提前3年,每对夫妻生育5胎,严禁避孕堕胎,对独身男女课以重税,给多子女以补贴。^③

战争使日本国民生活陷入悲惨境地,而日本当局继续从广大民众口中夺食,以支撑对外战争。根据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限制使用物资多达数十种,尤控制铁器生产,严禁制造铁壶和熨斗等物。耕田面积由于无力耕种,由1937年609万町步降为1941年580.7万町步;大米产量由1937年6632万石降为1941年5508万石。^④1939年对居民生产物资实行配给制。口粮配给标准依劳动

① (日)《战史丛书·陆军军需动员》2,附表二《生产力扩充计划生产实绩表》。

② (日)《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3,第122,283,114页。

③ (日)石川准吉:《国家总动员史》,资料编四,国家总动员刊行会,1972年,第1100~1101页。

④ (日)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统计》,岩波,1962年,第44页。

昭和 16 年(1941 年)初主要兵团配备表

地域	军	师 团	混成旅团	独立歩兵团	独立守备队	国境守备队	
内地和台湾	东部军	2. 51. 52.	(G.)	(61.)(62.)			
	中部军	16. 54.		(63.)(64.)			
	西部军	55. 56.		(65.)(66.)			
	北部军	7. 57.	桦	(67.)			
	台湾军						
朝鲜	朝鲜军	19. 20.					
满洲	关东军	第 3 军	8. 9. 12.		4.	1. 2. 10. 11.	
		第 4 军	1.		8.	5. 6. 7. 13.	
		第 5 军	11. 24. 25.			6.	3. 4. 12.
		第 6 军	14. 23.				8.
		直 属	10. 28.			1. 2. 3. 5. 7. 9.	9.
中国	中国派遣军	华北方面军	驻蒙军	26.	2.		
		第 1 军	36. 37. 41.	3. 4. 9. 16.			
		第 12 军	21. 32.	5. 6. 10.			
		直 属	27. 35. 110.	1. 7. 8. 15.			
		第 11 军	3. 4. 6. 13. 33. 34. 39. 40.	14. 18. 20			
		第 13 军	15. 17. 22. 116	11. 12. 13. 17.			
		华南方面军	G. 18. 38. 48. 104.	19.			
印度支那	印度支那派遣军						
	大本营直属	5.					

备注：航空兵团驻满洲，第 1、第 2、第 3 飞行集团分驻内地、满洲、中国。

强度而有区别,按 1941 年 3 月实行的规定,成人每天配给大米 330 克,可吸收营养成分计算为蛋白质 23.8 克、脂肪 1.7 克、碳水化合物 254.3 克、热量 1158 千卡。官方为配给标准作了大量舆论宣传,1941 年厚生省科学研究所公布“科研”数据,证明人体健康所需营养成分有蛋白质 70 克、脂肪 20 克、碳水化合物 370 克、热量 2000 卡便已足够。但这一数据仍高于配给量,于是又由御用学者论证:“日本人配有 330 克糙米、23 克酱和少量蔬菜(可吸收的营养为蛋白质 30 克、脂肪 10 克、碳水化合物 300 克、热量 1400 卡)就足够了。”^① 实际供应中又打了折扣,标准定为白米,后改为糙米,再后以面粉、大豆、高粱、白薯及土豆杂粮混合配给。杂粮占 60%,糙米占 40%。其他生活必需品,1940 年规定糖每人每月 300 克,火柴每人每天 5 根等,鱼肉虽规定配给但无力供应。上述营养标准(热量 1400 卡)只能满足人体在不劳动、不工作状态下维持生理最低限度要求。可参考的比较数据是:战后日本的自卫队队员营养标准,热量为 3300~3390 卡,相当于战前约 2.5 倍。^②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加强统制。1940 年 12 月颁布《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翌年 8 月又颁发《重要产业团体令》等多种法令,由日本军政当局分配生产任务,分配资金和原材料,还负责动员劳力,解散和合并企业,以及决定价格和利润等。一切生产均以战争为中心而运行,并为更大规模的战争而强化物资储备及对外采购。据美国方面统计,到 1941 年底,日本的铝土矿储备为 25 万吨,石油储备超过了一年用量,1942 年初武器储备相当于同年产量 6 倍,可装备 95 个师团,弹药储备为同年产量 5 倍。^③ 而日军战史记载,弹药达 105 个师团会战月份,车用汽油

① (日)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太平洋战争中的劳动力状况》,东洋经济新报社,1964 年,第 134,148,150 页。

② (日)1966 年《自卫队年鉴》,第 271 页。

③ (日)《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第 21~22,300 页。

35.7 万辆月份,航空兵弹药 77 飞行团月份,航空汽油 165 飞行团月份,军粮 370 师团月份。^①

日本牺牲国民生活,强化总体战体制,终于聚敛了又一大批战争物资。日军从 1938 年大规模对华作战消耗中喘过一口气来,作战力量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战争是综合国力、整体力量的竞赛,有限的储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日本的危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迅速消耗,来源特别是海外补充线路被掐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全面崩溃,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北南进策动与《日苏中立条约》

日军统帅部长期以来在北南进抉择上举措不定。所谓北进是以苏联、主要是远东地区为进攻方向,南进则是以被称为南洋的地区(包括西南太平洋海域及东南半岛诸地区)为进攻方向。但是无论北进还是南进,均是以朝鲜及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为战略基地。

按 1936 年制定的《国策基准》规定,日本实质上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两面扩张战略,“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向发展”。同时要求充实陆军军备,“与苏联在远东能够使用的兵力相对抗”,发展海军“能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但 1937 年“七七”之后,受侵华战争牵制,日军力量严重不足,故对北进还是南进较长时间内议而不定。1938 年 7 月,在东北边境张鼓峰地区同苏军冲突,日军第十九师团损伤惨重。1939 年 6 月至 8 月,关东军又同苏军在中蒙交界诺门坎地区激战,关东军曾出动兵力 6 万之众,伤亡 1/3,其中第二十三师团几被全歼。但此时日军束缚于对华作战,无法派出更多兵力,日军参谋本部 8 月 30 日对关东军命令:“大本营的企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在满洲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② 虽然损兵折

① (日)《战史丛书·陆军军需动员》2,第 497 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610 页。

将,也只能委屈求全。

1939年9月1日德国大规模进攻波兰,空前规模的欧战爆发。德国初战节节获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战争胃口,此时的日本欲乘英、法被牵制于欧洲之机,挥戈占其南洋殖民地,掠取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成了日本朝野上下的时髦话语。同年12月28日由陆、海、外三相制定《对华政策之方针纲要》,强调不介入欧战,停止北进,准备南进。参谋次长泽田茂说:日本国力投入了中国事变,缺乏余力,因此没有考虑以自身力量解决南方问题,“说到底还是借他人之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但同期的中国军队却发动了反攻,使日军承认“中国冬季攻势意外的强韧,我军逐渐陷入相当的苦战”。1940年夏秋,中国八路军又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使日军深感中国战场难以取胜,决定实施“大持久战”,收缩战线,逐步作到“兵力渐减”。此时其主要注意力仍置于中国战场。7月22日上台的第二次近卫内阁,于26日制定《基本国策纲要》,27日同大本营联席会议又制定《伴随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要纲》,强调:“首先将重点置于结束中国事变方面”,在此基础上“捕捉时机向南方发展”。而此时的日本在北面对苏作战问题上,却逡巡不前。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对南方兴趣已愈见浓厚,南进论开始抬头,甚至确定:“如果内外各种形势的发展特别有利,为解决南方问题,可以行使武力。”^②

根据上述方针,1940年9月23日日军武装侵入印支北部,打破了同法国的协议,以切断中国的南方补给线。该行动加剧了同英、美等国的矛盾。美国宣布对日禁运石油及废钢铁,英国重新开放缅甸公路,输送援蒋物资。日本完全切断中国南方补给线的企图落空。自此,日军在南方的战线缠绕于中国的补给线而移动,同英

① (日)《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281页。

②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436~437页。

美的矛盾酿成新的战争危机。

随着南进论的抬头,日本采取了新的外交行动。9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由日本支持德、意在欧洲的侵略战争,最大限度地牵制英国,而日本在南进时可以得到同样的支持。同时,日本又竭力调整对苏关系,尽管双方在北库页岛的煤和石油等利益



方面存在矛盾,仍于1941年4月13日达成妥协,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互不侵略,如对方和第三国

图 32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到火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送行。斯大林说:“我们都是亚洲人。”

发生军事行动时,另一方保守中立。双方还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互不可侵犯”。^①此外,苏联还继续供应煤、石油予日本,日本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双方在瓜分中国权益问题上达成暂时性一致,日本暂时放弃北进。日本还企图将苏联拉入日德意三国同盟而实现《四国协约》,同意将伊朗、印度等地域划归苏联势力范围。但苏联要价更高,要求在芬兰及巴尔干地区拥有更大势力范围,这同德国的要求相抵触。德国决心进攻苏联,四国协约谈判未有结果。尽管如此,日本通过《日苏中立条约》消除了北部之忧,转而放手南进,并在中国战场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发动新的全面攻势。国民政府的中条山根据地,就在这次攻势中失手。《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是促成日本南进的一个重要外交因素。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03~304页。

正当日本决定南进之际,德军又于1941年6月22日大举进攻苏联,这对日本战略抉择又带来了新的冲击。军部中的北进派再度抬头,与政府外相松冈等对苏强硬派相呼应,要求依据三国同盟条约,对苏开战,并认为夏秋之间是对苏开战最好时机,其时苏在战争中必遭削弱,日军称此攻击为“熟柿攻击”。但是,日本军政当局经过反复争论,认为在对华战争僵局之中,对苏作战还不成熟。参谋总长杉山元强调:“目前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海军方面也主张夺取南方英国领属的新加坡等殖民地,以改善日本战略地位,增强作战能力。7月2日御前会议最后决定《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方针第二条规定:“依然向着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同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南进也是为促成中国问题的解决,这在“要领”中有所说明:“为促使蒋介石政权屈服,进一步从南方区域施加压力。”为照顾北进派意见,不放弃北方的机会,仍决定要在合适时机对北方行“熟柿攻击”,在“要领”中决定“如果德苏战争进展至对帝国有利的时候,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以确保北方之安定”。^① 动议一时的北进论又被搁置下来。

作为南进论胜利的一个结果,7月18日改组了内阁,松冈被解职,丰田贞次郎继任外相,使政府能够协调南进战略。7月23日日军正式侵入印支南部,30日占领西贡。英美等随之决定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形势顿时紧张起来。8月4日日本联席会议制定《对苏外交谈判要纲》,准备向苏联表明日本将继续遵守《日苏中立条约》,放弃北进。8月9日御前会议制定《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等纲领,再度明确不惜对英美开战,日军南进之势不可逆转。10月16日东条英机组阁,并先后兼任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内务大臣、军需大臣、文部大臣、外务大臣等职,成为日本近现代以来揽权最多的

^①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531~532页。

首相,被称为“东条独裁”。东条独裁政权实质是日本空前强化的总体战独裁体制,是战时体制、南进体制,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极端形态。

在制定上述7月2日“要纲”之后,7月5日下达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命令,向中国东北和朝鲜等地调派军队70余万人、马匹14万匹、飞机600架,摆出对苏大规模作战架式。在北方虚晃一阵枪,即调头南下,进占西贡等要地,实施南进。关特演实质为惯用的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的战术,是日军南进之烟幕。

日军决定南进之目的,按参谋总长杉山在制定上述要纲时的说明:目前日本不向重庆政权直接施加压力“而相反向南方发展,以分断从背后支援重庆政权,使其抗战意志愈加增长的英美势力同重庆政权之联系,这是促进事变解决的极为必要的措施”。^①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也认为“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作为综合欧亚国际大变化之一环,才有解决的希望”。^②由此可见,所谓的南进,实质是侵华战争的继续,其主要目标之一仍在于解决中国事变。

太平洋战争的发动及其战略企图

日军在着手南进之际,即制定在太平洋及整个南洋地区的战争计划。9月3日御前会议制定《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不惜对美(英荷)一战”。11日在海军大学由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主持图上演习,研究对夏威夷及南方要地进行奇袭。10月初在陆军大学由参谋次长塚田攻主持南方作战图上演习,研究在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对英美军队作战。同月由陆相东条英机组成新内阁。11月5日御前会议批准大本营和政府通过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心对美英荷一战”,着手组建南方军。整个太平洋战争的作战部署,于11月底完成,陆军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舰队也到达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315页。

② (日)《日本历史》21,岩波书店,1963年,第163页。

了预定海域。并以对美和谈为掩护。12月2日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于12月8日展开进攻,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其战略企图概括有4:首先是掠取其自身所严重缺乏的战略资源,如法属印支及泰国的橡胶、锡和大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还要求在澳大利亚补给铁矿石、煤、小麦和羊毛等。日本在该地区的经济战略要求,有如1940年10月27日内阁会议制定的《发展同荷属东印度经济关系的措施》中所说:“应确认皇国在荷属东印度的优越地位;从共存共荣的大局出发,迅速与荷印谋求经济上的密切合作,以期开发并利用其丰富资源,使之实际上成为以皇国为中心的大东亚经济圈之一环。”^①战争结果,日本通过太平洋战争所掠夺的物资,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至1944年掠夺石油达519.5万千公升,^②橡胶达21.1万吨,锡达4.9万吨,各种物资总数在1000万吨以上。^③

再是打击英、美等国在南洋地区的军事力量,消灭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或迫其采取守势。故日军攻击目标选定美太平洋舰队主力及英国远东舰队,企图给予歼灭性打击。

第三是攻占该地区重要战略基地如菲律宾、香港、新加坡等,改善自身战略态势,拔掉英美等国在该地的战略支撑点。

第四通过在南方地区作战,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在该地区的外援力量,掐断滇缅路等南方补给线,隔绝中国在南方的对外联系,最后解决侵华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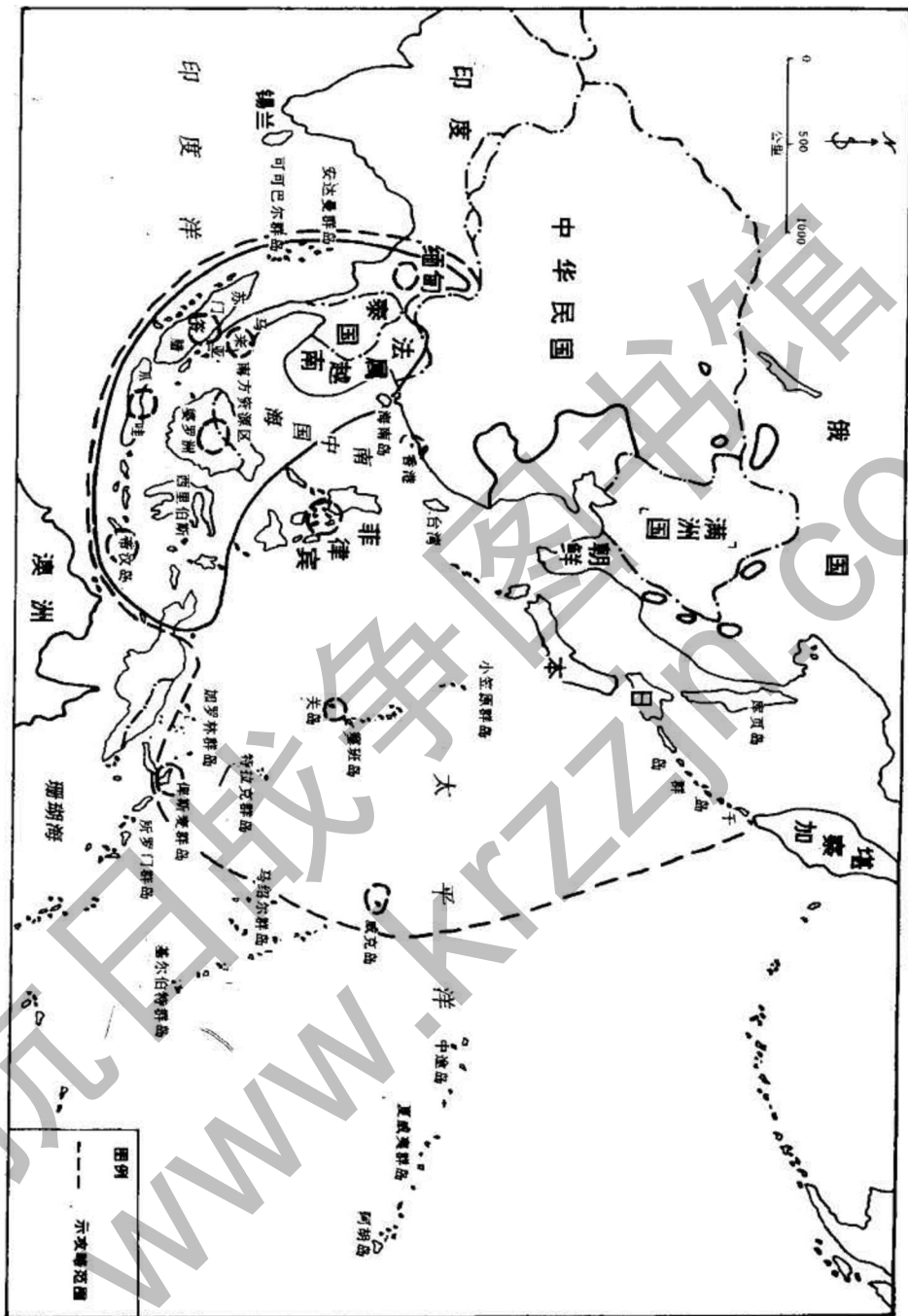
太平洋战争的发动,使日本的南进战略空前膨胀,数百万日本步兵散布在东亚大陆及西南太平洋诸多岛屿,海军舰队及其航空兵更冲击了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南逼澳洲,西进印度洋,作战范围几达半个地球,十数亿人口被日军卷入战火。如此巨大的一场战

①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462页。

② (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第39页。

③ (日)《日本历史》21,岩波书店,1981年,第127页。

日本南进「攻略范围」图



争,使日军的整个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打破了原设想的英美可分论,陷入对多国作战的严峻局面。按日本的《国防方针》及其多次修改后的宗旨,对多国作战虽有所准备,但力求避免。侵入印支前后对南进的最初考虑,也力图将英国与美国分开,尽量避免同美国开战。但太平洋战争的正式发动,使日本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陷入交战状态。日本既无道义上的力量,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却不甘心东条所担忧的:“坐等二三年将沦为三等国家”,^①不分主次地全面开战,作毫无希望的困兽之斗。

第二,使日本对外战争的中心和目标发生被动性飘移。日本自1931年开始侵华战争之后,10年间均以征服中国为基本目标,甚至在北方发生诺门坎那样的惨痛损失也未能转移日军的注意力。日军决定南进之初,亦曾将解决中国问题摆为战争的首要任务,决定以南进促进其解决。然而太平洋战争发动后,日军统帅部已没有能力驾驭这空前规模的战争。美军凭藉其数倍于日军的战争潜力,投入日军无法匹敌的海空力量,从海路直逼日本国门,海上战场成了决定日本胜负命运的又一中心战场。日军既无法以南进支持其对华战争,也无法从中国抽身全力投入太平洋战场。本来是企图为赢得侵华战争而扩大战争的,但战争的扩大招致兵力分散,国力消耗,弄得身不由己,多方挨打。尤其是对于侵华战争来说,正如日方战略家分析:“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就是对华战争的破产。”“尔后,战争指导的对象,主要移到南方。对华战争的指导,已被降低到把命运寄托在南方的从属地位,丧失了本来的性质,最后只好放弃对华战争的指导”。^②

当然,战争进行之初,日军在表面上也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587页。

②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40页。

胜利,其掠夺物资及攻占地盘部分地改善了日军的态势,但其取胜是有限的,后果更是灾难性的。

其作战简要情况是:日军对美军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的袭击,为太平洋战争的开场重戏。为确保胜利,日军投入了主力航母6艘、高速战舰2艘为基干的联合舰队主力。由于美军疏于戒备,在两小时作战中,被击沉击伤舰艇18艘(其中战列舰8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3艘)、击毁飞机188架、毙伤3500余人,而日军损失极小。由于美军航母不在港内,油库也未遭到轰炸,故能较快恢复作战力量。日军对珍珠港的攻击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战果并不充分。这次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还促使美国完全摆脱了国内的孤立主义,全力投入战争。日本在远东又多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

在南洋地区,日本对菲律宾、香港及东南亚半岛发动全面进攻。进攻菲律宾的日军为第十四军,辖第十六、第四十八师团和第六十五旅团及各种特种部队共约5.7万余人;海军为第三舰队、第十一航空舰队及陆军第五飞行集团等部,共有舰艇43艘、飞机500余架。守菲律宾美军及菲律宾国防军共约13万人。经过约半年激战,日军占领菲律宾全境,但菲律宾游击部队仍坚持抗战。

香港既是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金融、经济、军事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对外联络和物资输入的最重要窗口。日军投入第二十三军,辖第三十八师团、第五十一师团等部从陆上进攻,由陆军航空兵第一飞行团等部投入飞机约100余架配合作战,海军第二遣华舰队从海上配合进攻。日军切断了香港的淡水供应。经过半个月作战,守军被迫投降。

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被视为英国在东方势力的象征,因而也成为日军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对新加坡的进攻从陆上进攻马来亚作战开始。日军投入了最为精锐的第五、第十八和近卫等3个师团主力及坦克第三师团等部,分别在泰国的宋卡及马来亚北部地区登陆,沿东西海岸攻击前进,攻占首府吉隆坡。守

军退入新加坡。英军对新加坡守备甚严,但对于日军渡河作战方向估计错误,在正北方向防守不足。2月7日夜日军各部开始横渡海峡作战,英军未能展开有效反攻。激战到15日,双方都疲惫不堪,英军终于支持不住,宣布投降。新加坡失守,使英军在远东遭受了严重失败。

马来亚作战顺利进展,使日军抽调隶属该方向作战的第五十六师团加入第十五军序列,于1月下旬正式发动缅甸作战,占领了大半个缅甸,切断了通向云南的中缅公路,并准备进一步进攻印度。

日军还占领了西南太平洋重要岛屿关岛、威克岛等,2月19日袭击了澳大利亚北部海港达尔文港,3月23日占领印度洋上安达曼群岛,4月初袭击英军在科伦坡海军基地,英国东方舰队被迫撤往非洲东岸蒙巴萨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发动后半年内取得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胜利。

但5月在珊瑚海一战,日军损失小型航母1艘,重伤大型航母1艘,飞机损失及人员伤亡大于美军,日军攻击索尔兹比港的作战目的未能实现,所受损失直接影响到不到一个月之后发生的中途岛之战。以珊瑚海战为标志,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攻势已达于顶点,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

2. 太平洋开战后的对华战略

太平洋战争与中国战场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场联为一体,形成空前规模的全球战争。中国同广大反法西斯国家关系更为密切,摆脱了长期以来在东方单独抗战的不利局面,其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日本方面于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由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将

对英美等国的战争,包括对中国的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立即对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正式宣战,同时向英美等国建议,召开反轴心国各国的某种联合军事会议,又邀请英美等国大使和武官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抗日的具体计划,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12月23日,中国军委会主席蒋介石同美军代表勃里特少将、英军代表驻印总司令魏菲尔在重庆正式举行中美英三国军事会议。会上决定,中国接受英军邀请,派遣军队协助防卫缅甸,美国援助中国军队,准备展开对日攻势,还决定今后继续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等等。12月底,英美两国华盛顿会议决定,坚持ABC计划,以先欧后亚首先打败德国为最高指导方针。同时决定,调整对日战线,成立中国战区,组织由中英美三国代表组成的联合作战参谋部,加强对中国的援助。蒋介石同意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联合国军队。缅甸北部最初划入中国战区,其后改划南太平洋战区。中英美军事会议的召开与中国战区的成立,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有利于中国而削弱了日本战略态势。

1942年元旦,由罗斯福与丘吉尔拟定的有26国签字的联合国宣言正式发表,约定“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讲和”。这样开战前以经济封锁为主要手段的对日ABCD阵线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反法西斯军事合作阵线。该宣言领头签字国为美、英、苏、中四国,其余各国按国名字母排列。这一序列初步确定了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四强地位。中国四强地位的确定,同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关系密切。美国出自其远东战略的需要,支持中国的四强地位,而中国抗战自身的意义及其实际战绩,是中国战略地位上升的根本因素。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在2月23日的炉边谈话中他又

说：“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到来的反攻——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1943年10月，中国参加签署关于普遍安全问题的《四国宣言》。11月18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12月3日公布《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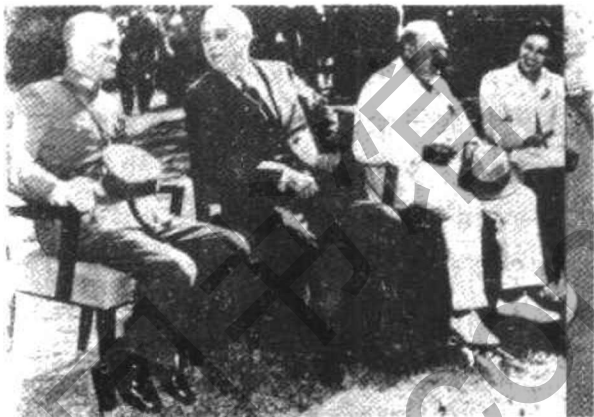


图 34 开罗会议三巨头

还确认朝鲜人民应获得独立，这也是孙中山在世时的主张，国民政府出自对战后东亚局势的稳定，坚持了这一看法，并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而朝鲜人民的各种独立组织也以中国为基地展开活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朝鲜独立主张初步表示同意。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方面还表示琉球群岛应归属中国，中国则答复由中美共管，其后国民政府出自国力因素及东亚国际关系的考虑，放弃了对琉球的接收。《开罗宣言》的制定和公布，是中国抗日战争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胜利，它统一了东方战场对日战略总目标，决定了日本外交战略的根本失败。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在12月的一次炉边谈话中指出：“英国、俄国、中国和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

^①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4、348页。

界大战的可能。”^①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促使美英等国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暧昧态度,采取实际行动提供援华贷款及其他军事物资。在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发动之初,美国发布过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及其他声明,对日本的战争行动表示反对,但实际没有明确的援华行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美国虽受冲击很大,但由于继续受制于国内的孤立主义,只发表了“隔离战争瘟疫”之类的含糊声明。1938年至1940年间虽曾借贷1.7亿美元予中国,但同时也继续保持了对日全面贸易。日本通过对美英等国的贸易,大规模采购包括战略物资在内的各种物资,维持了对华战争。日本侵入印支后美国态度趋于强硬,但最后还是因为珍珠港被炸,孤立主义才被一扫光,美国的对日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1942年2月7日,美国众参两院一致通过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还表示“利用合众国国会现已批准的款项将从物质上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减轻武装入侵所造成的经济和财政负担,以及解决对于我们共同敌人进行武装抵抗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生产和采购问题”。^②同时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这两笔款项,如果同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租借物资等援助总额108亿美元、同美国1941年3月通过的对外租借法案拨款70亿美元等数额相比,它的数量是相当少的。尽管如此,对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看,两笔贷款约合法币130余亿元,超过了国民政府的全部预算。对于饱受战争创伤而本身经济力量又极为单薄的中国来说,显然具有极大的意义。

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还使中国国民政府能有机会进一步推

①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54页。

②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5页。

进自卫的外交战略,对战争后期及战后形势作出初步安排。蒋介石于1942年2月出访印度,企图调整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印度和英国的关系,促进印度和英国的战时合作,抵制日本所使用的“亚洲民族解放”的谋略计划。同时还企图争取英国和印度的力量,解决缅甸问题,保护中国的西南运输线。这一访问虽未能取得完全成功,但在争取中英印在抗日方面的合作问题上是有收获的。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日战略得到了多方面的改善,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上过分依赖国际援助,在某些方向上作战比较积极,如为巩固后方补给线及扩充军力,曾主动派出最精锐部队第五军、第六军等部共约10余万赴缅作战,但在正面战场上却没有抓住时机改变消极应战战略,没以足够的努力改善态势,进而将国际上的有利形势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致使日军继续利用国民政府的弱点,保持攻势作战,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力求达成其对华政略与战略目标,使中国军民面临更为严峻的艰苦局面。

日军对华战略与作战

日军决定南进的同时试图提出更有效的对华战略。1941年10月18日,东条内阁成立后,首次内阁会议声明:“解决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期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乃帝国之坚定国策。”^①而解决中国事变的策案,按当时日军统帅部提议实施的,曾有两种办法,一是依据长期持久战原则,逐渐收缩在华兵力,只确保华北及华东三角洲地区;再是继续推行最强硬的进攻战略,例如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建议:“打倒了蒋就不会再有援蒋。华南方面军增加三四个师团,占领昆明,就能遮断缅甸路线。接着与华北方面发动进攻相配合,向重庆发动进攻,就能够消灭蒋政权。”^②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524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134页。

日军如果实施最强硬的作战方针，继续发动大规模攻势，必须投入更多的作战兵力，还须克服险峻的群山所造成的运输障碍，解决日军难以承受的战略物资消耗。况且，日军优势的海上力量，除一部可以加入长江运输之外，大部只能作壁上观了。这样的进攻，没有相当长期和认真的准备，是不可能实施的。在当时剧烈动荡的世界战争条件下，对富庶的、削弱了防守的南方捞上一把显然更为合算，这对日军来说确实是无法抵挡的诱惑。

对于收缩在华兵力方案，日军统帅部的看法如何？这是东条英机在组阁之前就反复申述了的：对于美国提出的从中国和法印撤兵问题，绝对不能接受，“如果接受美国的主张，中国事变的成果即被毁灭，进而危及满洲国的存在，且将动摇对朝鲜的统治。……要还原成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按东条的看法，纵使是部分收缩或部分撤兵，也不应给予考虑：“驻兵乃中心要害问题。应该坚持的必须坚持，让步会导致重复让步，甚至进而把命运攸关的驻兵让出去，结果等于是投降，愈加被美国所乘。”^① 所以，收缩战略是不会被接受的。

日军最后的抉择，对上述两种方案有所取舍折衷，日军统帅部9月25日制定《在对华作战中配合发动南方作战的行动》，规定其在南方和中国的作战目的是：“消灭美、英、荷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和确保南方要域，确立对中国的持久战态势，促使蒋政权屈服。”要求对华作战方针为：“向持久战态势转移，与海军协同采取政战略、谋略继续对敌施加压迫，以期蒋政权屈服，同时消灭在中国之英美等敌国各种势力。”^② 就是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对华战略的最后抉择是：摒弃收缩战略，在无力作最后全面进攻之前先行插足南方，希冀力量扩张之后再征服中国。这仍是一种

①（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520～521页。

②（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553页。

十分强硬的战略，即实施日军多年来力图避免的对多国作战战略。

在这艰难的对多国作战局势之下，日军对华作战与对南方作战的关系如何？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10月28日记述说：“对华战争在持久综合战争中应占从属地位，还是占决定性地位？需要调整陆海军对此问题的看法。”又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我在华占领地域显然为指导综合战争之基础，并担负资源供给任务。”“南方作战就兵力而言只占用陆军一部分兵力；但在资源方面南方作战显然具有决定意义”。^①就是说，日军将中国战场作为南进的依托或兵站，而又以南方资源为对华作战之支持，二者形成一个连环套。两者关系按日军统帅部、特别是陆军方面的看法仍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目标。但日军逐渐失去控制战场局势的能力，导致其战略重心与目标发生飘移，即堀场一雄所说“放弃对华战争指导”，南方战场成为救命战场，并在各战场作毫无希望的困兽之斗。

太平洋开战前夕，日军于12月3日给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在攻略南方要域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除作战之外，“实施对华谋略以促使抗日势力衰亡”，尤重视在经济力量的“现地自活”即就地补给，“加强就地自给方针，积极取得、利用占领区内外之资源，尽力增强我之战力”。^②该规定同过去所规定方针，特别是同最近的1941年8月所确定的任务方针相比较，有如下的区别和变化：

第一，改原定“摧毁敌之抗战意图”为“尽力击破敌之抗战力量”，信心已明显不足。

第二，华南地区第二十三军任务历来是遮断敌之补给线，这次为配合对香港的进攻，其任务规定为与各军相同的“强化对敌封锁，摧毁敌之继续作战企图使其衰亡”。

①（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555页。

②（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6～58页。

第三,历来重视的“随时实施对中国沿岸要点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以及“适时实施航空进攻作战,防止敌空军再建,同时压制或袭扰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并努力遮断其补给”等要点由于航空及海军兵力不足,而未再明确强调。

第四,作战与占领地范围扩大,原准备弃守的宜昌与襄西地区不再放弃,守护扬子江交通段也从武汉以下扩大到岳州以下。

从上述变化可见,日军在不顾国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还竭力扩大和强化侵华战争,使日军的侵华战略发生新的摇摆。

基于以上战略,日军在太平洋开战之后,也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新的作战。在华北战场,日本调集重兵,展开新的治安强化运动,强化对各根据地的严酷扫荡,在正面战场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其中以武汉的第十一军为主力对长沙的进攻为最重要的作战。其简况是:1941年12月24日,为配合对香港的进攻,牵制试图南向援助英军的中国军队,同时洗雪前两次攻打长沙未遂的耻辱,决定实施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作战。日军调集第三、第六、第四十等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等部共约12万人投入作战,并得到第三十四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等部在赣北地区的策应支援。中国方面集中兵力约37个师进行抗击。日军最初所订作战目的是配合香港攻势作牵制性作战,后中途扩大作战目标,企图攻占战略重镇长沙,翌年1月1日曾突入长沙一角。中国采取节节抗击、迂回两面的战法,顽强抗战,最终击败了日军对长沙的攻势。1月4日,日军开始败退,1月15日大体恢复原态势。日军战史记述对长沙之战“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伤亡人数为进攻香港的2倍以上;还承认这次作战失败,“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日军要恢复作战为“需一年有余”。^①第三次长沙作战而招致失败,在日军在太平洋取得一连串胜利之际,犹如一声棒喝,对日军影响甚大。第十一军司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300页。

令官阿南惟几不得不就长沙作战失败向派遣军总司令官表示谢罪。

同年4月,美军飞机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降落在中国机场。为阻止中美空军继续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日军决定自5月开始发动打通浙赣铁路作战,以摧毁沿线中国机场。日军共投入驻华东地区第十三军主力5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驻武汉地区第十一军两个师团,东西对进。到7月,东西两路日军在横峰会师,暂时打通了浙赣路,捣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等飞机场。但日军付出了巨大伤亡,第十三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在作战中被地雷炸死。日军捣毁了几处中国机场,但无法阻挡中美空军力量上升,无法改变空中力量的态势发生不利于日本的变化。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其对华作战有胜有败,没有什么建树。在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虽有收获,但在5月珊瑚海之战后亦转向下坡路。日军原设想以战争解救战争,以中国战场作南进基地,以南进收获支援对华作战,而实际是,中国战场趋向恶化,南方战场又要吞噬日军兵力,变成了恶性循环。日军统帅部所担心的,在中国战场的困境中,同时用兵于南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冒险”,^①已经变成了现实。

对华空中态势逆转

武汉作战之后,由于中国空军作战消耗严重,后随苏联空军的逐步撤离,到1940年底中国飞机数量由1937年开战时的314架降为65架,且多为老旧飞机,^②几乎无法继续作战。日本取得绝对制空权。

日军凭其空中优势即对中国西南、西北等后方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以打击中国抗战力量,动摇中国抗战意

①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1,第250页。

② 《抗日御侮》2,第112页。

志。日军的轰炸范围广、名目多,包括所谓“盐遮断”等专题轰炸在内,共炸城市或要点百余处。尤其是重庆被炸数十次,几乎被夷为平地。

但是中国继续坚持包括空中在内的各方面抗战。在日机轰炸之高潮中,1940年正式宣布重庆为陪都,致使罗斯福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说:“伟大的中国人民遭受了剧烈的损失;重庆已经几乎炸平——然而它仍然是打不垮的中国的首都。”^①另一方面更挖掘潜力,努力购置飞机恢复空军力量。1941年7月国民政府聘请一批美国志愿人员,正式成立美国飞行员志愿大队,由1937年来华的退伍上尉陈纳德任指挥官,初编练3个中队,陆续购置有P-40战斗机125架,此即“飞虎队”。1941年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援助租借法案,补充飞机陆续到达,同期又从苏联补充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48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飞机数量已得到基本恢复,飞机性能亦较日机为优。

日本对中国空军力量的恢复极为警觉,1941年8月12日大本营曾要求驻华军队:“有迹象表明中国空军正在美国支援下重建,应适时实施航空进攻作战,尽力加以阻止。”^②同时调派海军中型攻击机约200架抵汉口,准备对重庆发动进攻作战。



图 35 中美空军联合
作战,图为美国志愿队
“飞虎队”阵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陆日军飞机抽调太平洋战场。留大陆战场的飞行部队仍有:第一飞行团司令部、飞行第四十四战队,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本部、独立飞行第六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三、第

①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6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396页。

十、第十八中队等部。^①此时，日空军投入华北地区治安肃正作战、第三次长沙作战、浙赣作战等战役，对西南内地的轰炸暂时停止。因为日本空中力量对比中国空军仍占优势，国民政府拟定了《空军游击计划大纲》，自1942年初对日军展开灵活的“空中游击作战”，小编队奇袭与大编队出击相结合，利用机场多、地域广的特点，转场迅速，飘忽不定，轰炸日军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反击日本空中作战，拦截日军轰炸机队，等等。由于中国飞行员斗志顽强，美军飞行员技术较好，飞机性能优越，取得了很大战果。同年7月美国援华一个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来华，同第二十三航空大队等部共组为援华空中特遣队，在此基础上于1943年3月成立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为司令。空军力量又有增强。

日本被迫向大陆继续补充空中力量，7月调南方军第三飞行师团，归隶中国派遣军，强化大陆上空作战，并协同华北、华中等地区地面作战，还计划用为进攻四川的突击力量。1943年9月22日，日本计划在年产飞机两万架的基础上，扩充飞行部队200个中队，同时决定在中国设置第五



图36 盟军飞机
轰炸日本本土

航空军，以对付日益增强的中美空军。随着日军太平洋战场形势恶化，盟军展开反攻，日本空军作战任务也发生了变化。1943年2月27日大本营对派遣军任务规定：“在击破在华敌空军的同时，防止敌军对帝国本土空袭之企图。”^②翌年进行的一号作战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攻击西南、华中等地区的中国空军基地，防止中美飞机利用

① (日)《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第236页。

② (日)《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第335~336页。

中国机场轰炸日本。

中美空军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很大,除了面对优势日本空军作战,还须解决严重的补给障碍。如航空用油及零配机件都严重缺乏。依靠驼峰线运到昆明的补给品,需用汽车装运到贵州的独山,转用铁路运至衡阳等前线机场。在贵州山路的汽车燃料主要为酒精,运一吨补给品到前线机场需8个星期,途中损耗较大。据统计在上海投掷一吨炸弹,需从美国运18吨物资到印度港口;在中国境内空运汽油,每运一加仑就须消耗一加仑,运到前线每运两加仑消耗三加仑;从印度港口运汽油到中国西南地区前线基地,总代价是6:1。B-24重轰炸机机群须飞越驼峰线三次,才能运来一次战斗所需汽油。^①

但这些障碍都被克服了,中美空军力量在对日作战中日益壮大。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团正式成立于桂林,美国向中国增派第二十航空队,装备有空中超级堡垒B-29型重轰炸机,B-29机以成都及印度加尔各答为基地。25日,中美空军对日军在台湾的新竹机场首次空袭,翌年6月16日B-29机从成都起飞远程飞行轰炸日本八幡钢铁基地。到年底B-29机对日本本土及各占领地共投下炸弹3623吨,^②创下历史上最长距离的空中轰炸行动纪录。在空中作战方面,日军也遭受了许多惨痛打击,1943年9月9日侵华日军空军最高指挥官、第三飞行师团师团长中菡盛孝中将在广东上空被中美空军拦截,座机被击落,师团长连同作战主任参谋官泽太郎中佐、情报主任参谋高田增实少佐等人被击毙,使日军深受震动。不到半个月日军即制定计划将第三师团扩编为第五航空军,翌年2月15日正式编成,以挽回空中颓势,军司令官为下山琢磨中将,隶属于中国派遣军。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84~885页。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89页。

日本大陆航空单位虽然越编越大,但其作战飞机被歼灭越来越多,双方力量对比变化迅速,到1944年夏据日军第五航空军报告说,中美飞机上升为667架,日本飞机只有220架,双方比例为3:1。^①日本失去了制空权。冈村宁次同年8月转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主持攻占广西的桂柳作战。他从汉口到衡阳,因惧怕中美空军截击,飞行只能早晚进行,而陆路也只有黄昏才安全,故本来只需半天路程,却花了3天时间才上任到位。他在回忆录中说:“但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②日本在大陆上空的困窘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本是近代化途中的后进国家,工业落后,廿年代虽曾试产飞机,但基本上无法自产。而日本飞机年产数千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实行倾斜式飞机生产,1943年年产达1.6万架,1944年达2.8万架。^③但是,中国军民实行长期坚决抗战,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赢得苏、美及其它大多数国家支持,终于改变了空中战场的态势。中国广大的耕作于田陇的普通民众,也为这一战略态势转变提供了直接的贡献。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搏斗多年的美国空军指挥官陈纳德说:“不论日机在中国机场跑道上炸多少洞,一大群中国民工在几点钟内即可把它们修好。有一次桂林遭空袭后,45个大洞在两小时内就填好了。日本轰炸这些飞机场唯一的有效办法是奇袭中美空军机场上的飞机,可是中国人的警报网使这件事简直行不通。”又说:“那些瘦削而有筋力的中国民工们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论日军攻占了多少飞机场,美空军仍旧能够继续活动。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迅速地建筑飞机场。这样,第十四航空

① (日)《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第492页。

② 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43页。

③ (日)《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社,1972年,第304页。

队就如一条怪蛇，日军毁了一个飞机场，就有两个新飞机场产生了。”^①

建筑在极不对称的中日工业基础上的空中力量对比，终于翻了一个倒转。1940年日本在大陆上空握有绝对制空权，中国的空中力量接近为零，到1943年日本飞机产量接近两万架，中日双方力量却接近平衡；1944年日本飞机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但“制空权逐渐落入敌手”。^②日本在空中力量方面的态势逆转，是日军战略逐渐崩溃的一个重要反映。

3. 太平洋开战后的对华政略

大东亚省与大东亚会议

日本为加强对其庞大的占领地区的殖民统治，打出“殖民解放”的谋略旗帜，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描绘为把亚洲从欧美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东条英机首相还在其演说中称：“使大东亚各国及各民族各得其所，根据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谋求确立共存共荣之秩序。”^③在这“解放”与“共存共荣”旗帜之下，又公开鼓吹实行暴力与征服。东条1942年1月21日在第79届议会上演说的施政方针，由《朝日新闻夕刊》登载，第一条：“在使英美屈服之前应把战争进行到底”，第七条：“重庆政权必须彻底加以击碎”，第九条：“国内施政首先必须以作战第一原则为指导方针，增进并强化完成战争之能力为先决条件，必须作到军队、政府和民众一致，集中总体力量”。^④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01页。

② (日)《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第591页。

③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6页。

④ (日)《战争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355~356页。

在“解放”与“新秩序”的旗帜之下，日军决定集中和统一各方面力量，对占领区政治与行政方面加强实质性的殖民控制。1942年2月，日本陆海军、兴亚院和企画院联合研究“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规定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① 11月1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官制》，设置大东亚大臣，由文官担任。其第一条规定职权范围：“大东亚大臣负责实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及桦太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事，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外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植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和监督”。^② 大东亚省的行政机构下辖四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另设大东亚联络委员会。大东亚省的设置，企图调整原兴亚院与外务省派出的双层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全都并入大东亚省，废兴亚院官制。按上述规定，除少数“纯外交”之外，外务省不再担负上述大东亚地区内的外交政务，权力被削弱，东乡外相由此而辞职表示反对。

大东亚省这一机构实际也未能真正掌握所规定在该地区内的政务，按上述官制第19条规定：“大东亚省应同陆海军策应合作，执行有关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地行政事务。”^③ 实权显然由军部控制，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是由军部进一步剥夺了政府在殖民地的行政权力。陆军还进一步要求由各地军司令官

① 信夫清三部：《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第684页。

②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8页。

③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8页。

兼任驻在地区(国家)大使,由于海军方面加以反对而未能实现。对于被占领地区的国民来说,一旦被日军占领,虽然挂着“新秩序”与“解放”的招牌,但实质已为日本之一行政区,不再具有普通意义的外交关系,因为《大东亚省官制》已经从实质上使“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① 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伴随太平洋战争的作战行动而展开的一个重要的殖民政治步骤。

大东亚省设置于中途岛战败、即太平洋战争走向下坡路之时,目的是协助挽回战争颓势。随着战争态势的进一步恶化,大东亚省的活动以及对各国的政略也有新的变化。1943年5月29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和5月31日御前会议制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其方针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整备和强化政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增强了谋略色彩。其第二条规定大东亚政略与侵华战争关系:“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家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②

基于上述想法,日本10月30日同汪精卫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几天后又召开“大东亚会议”,将日本同各傀儡或亲日政权排列座次如下:

日本帝国	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
中华民国	行政院长汪兆铭
泰国	内阁总理銮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
满洲国	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菲律宾共和国	总统何塞·P·拉乌雷尔
缅甸国	内阁总理大臣巴·莫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第685页。

②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3页。

作为旁听的是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斯帕斯·钦德拉·鲍斯。泰国首相銮披汶原定参加会议,但由于日本召开会议目标在于“世界性宣传效果”,而国内的反日气氛高涨,故拒绝参加,致使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①

会议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

“然而,美英为本国的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尤其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终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

“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根据下述纲领建设大东亚,以期确立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一、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一、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扬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一、大东亚各国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一、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为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②

宣言继续提出所谓“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自主”,“实现互助敦睦”,“亲睦友谊”,“消灭人种差别”等虚伪口号,同时强调各国应“同心协力”、“紧密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企图将各仆从国继续捆绑在日本的战车上。

① (日)《杉山笔记》下,第496、501页。

② 引自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2,商务印书馆,第816~817页。

通过大东亚会议的召开,日本安排和改组了大东亚殖民体系。朝鲜和中国台湾作为日本所属版图之一部分,不在大东亚会议之列。整个大东亚殖民体系共分三个层次:内层以日本本土及其控制的朝鲜和台湾为核心,中层即日满华体制,外层为太平洋开战后的占领区。其中日满华体制是日本殖民体制的基本骨架,亦是其核心与外层之连结与过渡。因此,不管各方向战事多么剧烈和复杂,分割侵占东北并征服中国,为日本整个大东亚殖民政策的根本要求。

对华新政策

配合大东亚政略的推行,日本又在中国占领区推行所谓“对华新政策”。如同其大东亚政略是为弥补太平洋战争颓势一样,其对华新政策也是在战略作战遭受挫败形势下的产物。日军在华北战场进行连续多次的治安强化运动,包括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五一”大扫荡之类严酷的军事扫荡,但华北抗日力量渡过了1941年、1942年低谷期,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正面战场日军对国民政府军队发动多次大规模作战,如第三次长沙作战(1941.12—1942.1)、浙赣会战(1942.4—5)、鄂西会战(1943.4)、常德会战(1943.11)等,均劳师无功。日军还曾计划对四川发动最后决战,以从根本上击溃国民政府,却一拖再拖,最后于1942年底下令正式中止对四川的决战计划。因此,日军决定在不利的军事形势下,从傀儡政权方面做文章,改善侵华战场态势。

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提出实行对华新政策。其基本办法是,改变过去不让汪政权正式参战、避免汪力量发展变得尾大不掉的决定,让汪加入轴心国一方,向英美公开宣战,企图以此“打开日本和中国现状之一大转机,遵循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专注于强化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同时扑灭重庆政府抗日之口实,和新生中国一道真正向着完成共同的战争而迈进”。由此而确定的各项政策是:1. 强化(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包括强化对各地方政府的指导,在形式

上废除在中国的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确实地维持治安等各项措施；2. 经济政策方面，“以增加和获取为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宗旨，重点开发占领地区内的紧要物资，并积极努力地努力夺取敌方物资”；3. 对重庆政府政策，强迫其屈服，“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① 根据这一构想，翌年1月9日签订《日华共同宣言》及归还租界、废治外法权等协定。日军将日占区内部分英美财产移交汪政权，还移交了天津和广州的英法租界等。

9月18日大本营联络会议制定了日华基本条约修改要纲，10月30日由汪精卫、陈公博赴日签字，缔结《日华同盟条约》。该条约“为维护日本及中华民国两国间永久的睦邻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及领土完整”、“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为确保大东亚之建设和安定，应相互密切合作进行各种援助”，等等。在附属议定书中又写道：“日本国承诺，两国间实现全面和平并结束战争状态之时，将撤走派遣到中华民国领土内的日本国军队。日本国放弃根据庚子事变的北京议定书及有关文件所获得的驻兵权。”^② 这一条约的签定使1940年《日华基本条约》连同其附属文书“一同失效”。两个条约相比，同盟条约作出了更多的“让步”，如放弃驻兵权，废除日本对华北、蒙疆、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华南沿岸岛屿等地带的特殊要求，关于中国政权组建问题作为内政处理，日本不再坚持让重庆政府“屈服”，等等。日本试图以此粉刷汪政权，使其更具有“独立”、“公正”的代表性，以消磨中国抗战力量的斗志。

该条约缔结后，日军大力宣传一下子解决了日中间多年来的悬案。汪政权也吹嘘“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是“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③ 汪精卫直接发表声明，声称已经取得了巨大

① (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0页。

②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684页。

③ 褚民谊讲话，见1943年3月5日上海《中华日报》。

外交胜利,对日本恩典表示由衷感谢。但是,以日华同盟条约为代表的日本对华政策,仍是十足的谋略性骗局。条文中继续规定战争期间中国“对日合作”,日本将藉此无限期驻兵并实行殖民占领;经济上“尤其有关战争期间的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使充分满足帝国的要求”;另对于日本所占领的东北作为“满洲国”继续存在,没有将其归还中国。况且,这一切都是在日本濒临溃败的时候许下的空头支票,日军可以随时从毫无力量的汪政权手中撕毁条约,掠走一切。

“新政策”所说提高汪政权政治地位,实质上也不会兑现。要求公开参战,获取更多的实权,这本身是汪政权一直在同日本讨价还价的问题。汪政权的企图是正式参战,可以粉刷门面,“统一并振奋民心”,“接收英美在华权益”,并且力争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①再者,汪政权企图通过参战而增强力量,对各地分治政权实施统一。但是,汪政权上述企图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日军的分治合作原则不会真正放弃,蒙疆、华北及华东各系统伪政权都是日军用刺刀支撑起来的,绝不会听命于汪。第二,自1942年后大批国民党军队降归于汪政权,汪之军事力量表面膨胀,实质既不统一也无力量。因为降军割据一方,同汪只有名义上的归属关系,只接受日军调遣,有的还继续保持同重庆的联系,甚至服从重庆政权的指示。所以汪政权的统一之梦是无法实现的,而日军企图抬高汪政权,弥补千疮百孔的侵华战局,自然也是徒劳。

加强对华经济掠夺

日本的资源与市场严重依赖海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目的十分明确。1940年7月27日大本营通过《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应从对英美的经济依赖态势中摆脱出来,以日满华为骨干,大致以印度以东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组成部分,确立

^①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81页。

经济自给体系”。^① 日军按既定方案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广大地区实施军管，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实施经济掠夺。1942年1月21日东条在第79次议会上发表演说：“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② 2月6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日本对外经济问题，28日联席会议通过《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的计划决议，将中国、朝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划入日本的“资源圈”，印度和澳洲为“补给圈”，强调：“本资源圈应以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为骨干，期望帝国战争力量划时期的充实和扩大。”^③ 要求日本在今后15年（即从1942年至1957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应达到：钢铁3000万吨、铁矿石6000万吨、煤约2亿吨，等等。

日本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经济情况，唯有在中国东北地区较能满意。这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统治时间较长，镇压严酷，而东北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太有利于抗日游击战争，致使日军能较为巩固地统治该地区，部分完成了在该地区的经济计划。“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而华北等地除武装劫掠之外，殖民生产十分有限，统治形势日益恶化。为支撑越来越大的战争消耗，日军不得不大量动用储备物资，至1943年春战略物资储备已消耗殆尽。因此，日军不但企图在南方各地强化经济掠夺，还制定更详尽的计划并更为严酷地实施对华经济掠夺。

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规定：“1. 当前对华经济施策，以增加获取为完成战争之必要物资为主要宗旨，应在占领地区内开发和获取重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57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0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487页。

要物资,并积极地获取敌方物资;2.经济政策之实行,在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之同时,发挥中国方面官、民之责任与创造精神,由其积极地对日合作而取得成果。”^①翌年同汪精卫政权缔结的《日华同盟条约》强调:“两国要以互惠为基础的紧密经济合作相互约束,尤其有关战争期间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使其充分满足帝国的要求。”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多次强调:“为了促进中国官、民积极的经济活动及其对日合作,当前应使日华合办的中国公司名符其实地置于中国方面监督之下,对其资本、人事安排,免税特权等加以彻底的调整。”青木还说:“就处理地产来看,当地都是‘抄来主义’,即租界虽然交还,但仓库、房屋等凡是比较值钱的东西都一律抄来的思想。这样租界里就将一无所有,这种交还方法,民心也就不能不叛离。”青木据此建议:“统制尽量让中国人去搞怎么样?现在这些工作全由日本人来搞,日本的组合(同业公会、行会)等从中大发横财。”^②这些话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对华财产掠夺状况。要求改变这种直接的“抄来主义”即劫掠政策,不用或少用“军管”等直接劫掠办法,改行“购买”等法“谋求物资调拨的合理化、以及物资收购价格的恰当”,^③这些建议和讨论也是促成日本的“对华新政策”制定的原因之一。

日本的对华经济掠夺在实际上远比上述文字所反映的更为严酷。在华北的原材料掠夺方面,如果以1939年输出数字为100,到1942年则增加为:煤160,铁矿石900,盐265,棉花289。其中仅1940年,日本从华北运走的煤即达450万吨、铁矿石约30万吨、棉花达42.8万担。^④日军战史也记载:“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民众生活更加紧了压迫,逐渐出现了各种困难问题。”尽管如此,日军仍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580页。

②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2,第659,650页。

③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19页。

④ 转见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第346页。

通过《剿共指针》等各种文件，强调“取得对华所需物资”，要求事项有：

“一、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要求中国提供各种大量物资，将对民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努力贯彻中国参战意义，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由中国方面负责设法保证供应必需物资。”

二、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取得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物资，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这些物资。

四、对于要求中国供应物资，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绝对予以确保，而且应看到，随着战局的激化，所需数量必将逐渐增大……

五、粮食、棉花，是华北土产物资中最重要的物资，其收购的成败，直接对完成战争及重要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军队对此等物资的收购政策，必须经常给以强有力的妥善的支援……”而对于蒙疆地区，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提供重要国防资源”。^①

在江南地区，由汪精卫政权配合，日本规定了物价管理政策，设置了全国商业统制会、物资统制审议会和物资调查委员会等组织。在商业统制会下面分设棉统会、粮统会等重要物资统制会。日军试图通过这些组织，严格实施商品登记，控制其流动。日本所谓的收购是强制性收购，价格低于市价。粮统会 1943 年在江南各地以“分担制”和“收买制”等办法，以低于市价 50% 的价格强制收购

^①（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 380~382 页。

粮食,据统计“收买数量共计63万吨”。^①江南地区原是英美资本集中之地,日本占领后将其攫为己有,为表示“殖民解放”的意义,1940年至1942年三年中日本曾“发还”中方人士约60家,1943年又发还42家。^②所谓发还其相当部分仍须向日本交付抵债费用。其余绝大部分江南产业或归日本华中振兴会社、华北开发会社等经营,或归其他日本财阀控制,完全不在发还之列。

日军还在各地以金融、货币手段,或伪造中方通货,或在其占领区滥发伪币,以聚敛财富,破坏中国金融。以江南地区为例,原流通汪、蒋币及日本军票。1941年1月6日汪政权建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央储备券,与国民政府的法币等价使用,翌年2月18日开始限制兑换,3月停止等价交换,5月禁止法币流通,并限期兑换旧币。强制以汪币统一法币,同时滥发伪币搜括财富。

在日军没有控制的地区,尤其对于华北地区的抗战根据地,主要手段是“采取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或实行夺取物资的作战,从敌区获取物资,并破坏敌方的金融活动”。^③为此不断对抗战力量的仓库、生产设备等进行作战,或在收获季节发动进攻,抢掠粮棉;或以作战破坏根据地的生产与收割。而经济谋略手段有:1.采取没收等方法取得敌方货币进行采购。2.运出不必需的物资作为交换品,从敌方吸收我方必需品或敌方抗战必需物资。3.利用敌方商人,或设置由特务机关监督的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或利用武装团体灵活运用交易制度进行买卖等,主要通过准治安地区进行谋略性采购。日军还得出结论:“武力战就是经济战。”^④将经济内容与武力作战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太平洋开战后,日军施展更多的经济谋略,强化对华经

①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② 《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23页。

③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269页。

④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269页。

济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是千疮百孔,“中央和地方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未能收效”,日军内部也屡屡要求调整其经济谋略政策:“由于经济政策是促进政治、思想对策完成的基础,因此现在必须有断然飞跃革新的热情”。^①

4. 东南亚战场与中国补给线

日本侵入印支北南地区

武汉会战后,中国政府退守大西南,战争转入僵持。截断重庆政府的军需补给,在日军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1939年冬至1940年夏秋间,中国发动“冬季攻势”与“百团大战”,日军受创,决定在1940年秋必须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手来应付国际局势,于是切断中国补给线问题受到突出的重视。

日军对中国补给线的作战决策来源于其情报分析。日军开动情报机关全力摸清中国的补充渠道,满铁调查部1939年6月组成“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翌年6月完成10册《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其中第十册介绍各国对华援助情况。报告强调:重庆的力量来源于外来援助,只有切断其南方补给线方能迫使中国投降。根据日军参谋本部判断,中国的外援路线和数量如下表(见下页)。^②

南方输入占绝大部分,而法属印支又接近输入量的1/2。为了切断中国的南方补给线,1939年11月日军曾发动南宁作战,但未能成功。此后,日军拟定3个方案来达成这一目的:第一,以武力占领法属印支;第二,进攻昆明同时切断法属印支和缅甸两条路线;第三,以外交手段断绝法属印支路线。由于对云南作战困难太大,

① (日)《战史丛书·华北的治安战》2,第386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44页。

路线 \ 数量与变化	欧战前(吨)	1940年6月(吨)
西北	200	500
缅甸运输线	2000	10000
法属印支	12500	15000
华中华南沿海	不明	6000
计	14700	31500

无法实施,日军集中力量准备推行第一、三两案。1940年6月,德军在欧战中锋锐正盛,6月14日占领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日军决定趁法国败亡之际,进占法属印支北部地区,以切断滇越路,遂于16日下令对镇南关等地区发动进攻。7月1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到达龙州,将老开(老街)铁桥的铁轨拆除,滇越铁路正式被切断。日军拟更大规模地占领法印北部,却因陆海军协同作战问题未能决定,故暂未实施。

7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世界形势的发展及时局处理纲要》,决定: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同时,继续改善内外形势,努力捕捉时机以解决南方问题,而其要领第一条规定:“在有关中国事变之处理尤应消灭第三国的援蒋行为,用尽所有手段而促使重庆政权迅速降伏。”其援蒋路线首先重视法属印支、香港等地,决定对法印可以“视情况而定行使武力”,对香港和缅甸等路线也要全力作好遮断的准备。日军估计到对香港和缅甸的进攻必然会动摇美国的战略利益,故提出“英、美可分论”,企图单独对英开战,而避免同美国作战。^①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上述决策得到肯定,27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对上述纲要略加修改后通过。同时华南方面军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50页。

脱离中国派遣军序列，直隶大本营，近卫师团归隶华南方面军。规定方面军的任务是“遮断敌之补给联络路线”。^①

日军磨刀霍霍，势头汹汹，英国被迫妥协，于7月9日宣布关闭缅甸公路，时间3个月。8月30日法国亦向日本低头，签订《松冈——亨利协定》，9月4日又签订《西原——乌尔丁协定》，同意日军通过法印并使用其机场，最后完全同意日军和平进驻，封锁对华运输线。但日军不满足，故意挑起磨擦冲突，强行武装进驻，9月22日派兵自海陆两路经镇南关及海防侵入法印北部，引起战斗，印支军队战败投降。

日军侵入印支北部引起国际上强烈反响，9月26日美国宣布禁止废钢铁出口，10月18日英国重新开放缅甸公路，继续输送援华物资。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东方抗日的ABCD联合战线。进驻法印北部还导致日军战略发生混乱，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被指责“现地指导不当”受到停职处分。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任职的慎重派堀场一雄评论说，日军跨过镇南关侵入印支北部，有如日军跨过山海关引起全面侵华战争一样，是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日军继续寻找时机吞并印支南部地区。同年11月30日，日本在延缓近一年之后，正式承认了汪精卫政权，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战略攻势。翌年4月13日又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免去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南下。6月22日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北进论一度抬头，但仍未能改变日军继续南进的势头。6月25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关于促进南方施策》，强调要“按照既定方针促进对法印、泰的施策，……尽快和法印结成以保卫和安定东亚为目的的军事性联合关系”。^②尤重视金边、西贡等8处航空基地与西贡、金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8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304~305页。

兰湾两处港湾基地。会后由近卫首相纠集参谋总长杉山及海军军令部长永野联合上奏，强调立即进驻南部印支：“迅速采取对抗英、美、荷、中联合对日包围态势的措施，对目前处理中国事变或保卫东亚安定及确立自存自卫态势之需要，均属紧急不可缺少之施策。为此，与法属印支之间建立军事结合关系，尤为当务之急。”^①

日军对印支南部的侵入以外交压力先行，7月14日日本驻法大使奉命同法国维希政府谈判，同时由新成立的第二十五军作进驻准备。法国维希政府被迫完全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日军28日开始进驻西贡、金兰湾、芽庄等要地，29日签订《日法议定书》，在印支实行所谓“共同防卫”，实际吞并了南北法印。

日军的扩张迫使美、英、荷等国作出新的反应。日法谈判时期，美国劝告日本停止进驻，建议在印支实施中立化，未被接受。26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8月1日宣布停止对日输出石油。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荷兰等国如法炮制，英国通告废除《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日印通商条约》和《日缅通商条约》等。日本在东方空前孤立，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特别是石油禁运，将使日本战争机器面临停转危机。

日军侵入法属印支、特别是印支南部地区所引起严重后果，日本是有所估计的。但日本军政当局认为：先发制人，抢占要地，或许能遏制英美各国，并断绝中国外援从而促成中国投降。而实际相反，中国坚持抗战，英美两国没有分开，英美等国对华关系也更为密切。日本全盘计划均为落空，唯有作困兽之斗。正如7月31日海军军令部长永野的上奏所说：“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从而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费罄尽，与其这样，莫如马上动手，除此别

^①（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315页。

无他途。”^①可以说,是中国的抗战与补给线问题,迫使日本扩大战争,加速南进。

滇缅作战及其战略意义

进攻缅甸是日军南进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军的作战意图由多方面构成。从物产等经济因素看,缅甸盛产日本人所喜食的大米,年产700万吨,输出360万吨;石油年产110万吨,且有从石油城仁安羌到仰光的输油管,运输方便;再是铅,年产7万至8万吨,而日本年需量约8万吨。第二,从军事战略因素看,攻占缅甸可切断中国在南方陆上最后一条主要运输线,由此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可以促进解决中国问题,还可以将缅甸作为日军南部战场的屏障。第三,从作战实施的可能性上看,据日军情报部门调查,驻缅敌军总数约3.7万至3.8万人,其中英军约2个大队,飞机约70至80架,“总之在军队方面没有值得惧怕的部队”。^②

日军对缅甸的作战任务、兵力部署及行动计划,在策划及实施过程中变化很大。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军统帅部于12月19日确定在缅甸的“作战目的:在于切断援蒋路线的同时,在缅甸方面扫荡英国势力,占领并确保缅甸要域”。^③开战后于1942年1月14日制定《缅甸作战要领》,规定其作战目的有:“(一)为马来作战之侧翼提供安全;(二)遮断援蒋路线;(三)在对付印度(英国)的同时强化对中国的压逼。”^④作战部长田中新一还在其业务日志上记载:“重新分析有关缅甸作战:一、将蒋军诱至北部缅甸加以一举歼灭,向全世界证明蒋军之脆弱性,同时寻求为解决中国事变的一个转折;二、应为上述设想制定作战方案,组建指挥机构和部署兵力;三、认识缅甸作战的价值,即对印度洋、对印度、对重庆、对法印、对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第67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218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218页。

④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2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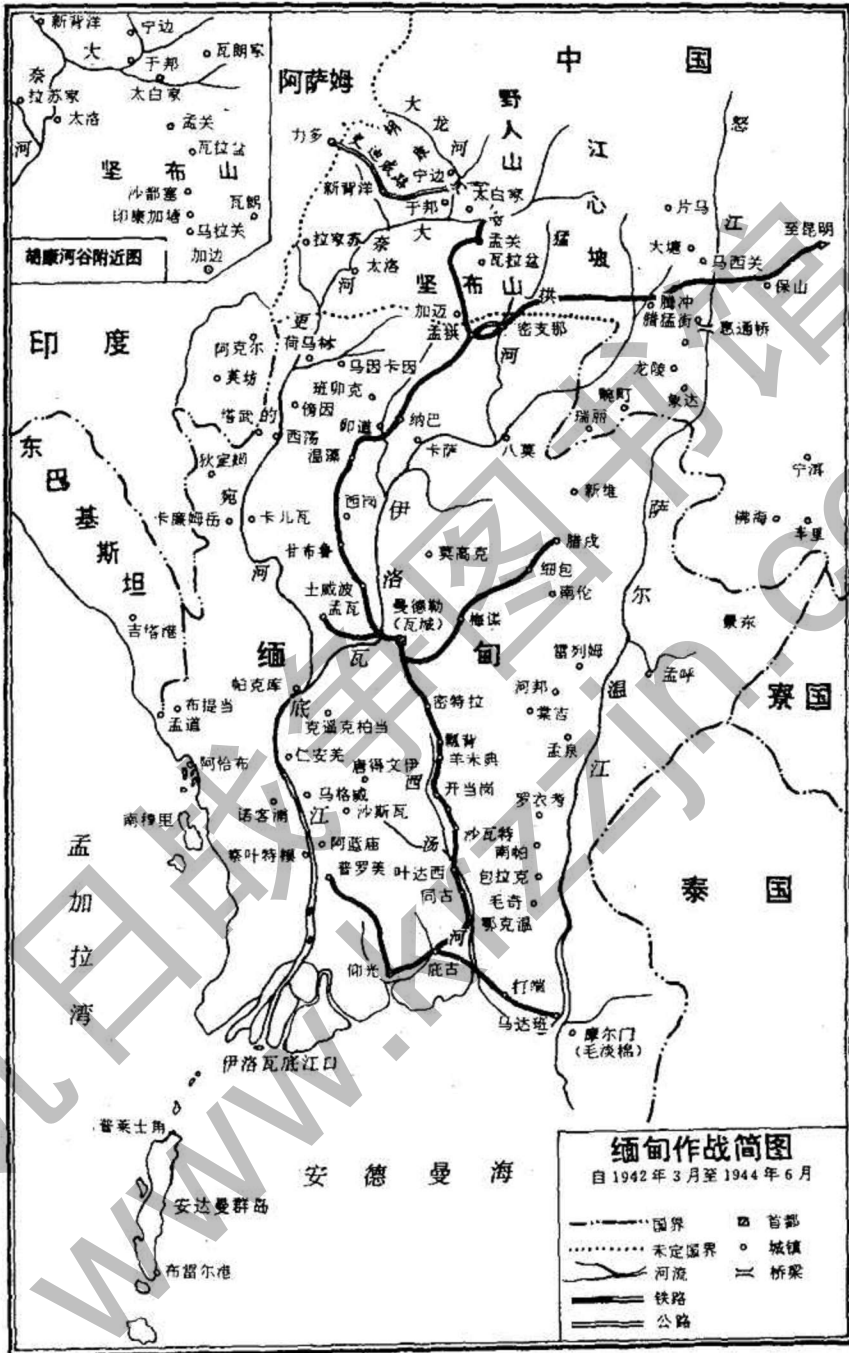


图 37

泰等诸方面。”^①

1941年12月中下旬,由英方邀请,中国派出部分军队进入缅甸,支援英军作战。日军对于出现在缅甸的中国军队十分重视。1月22日陆、海军部联合制定《陆海军中央部关于缅甸作战协定》:“缅甸作战之目的在于摧毁在缅之敌,占领并确保占领地,同时强化对中国之压力。”^②没有规定英军为主要对手,而以“在缅敌军”统称中、英两国军队。按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的解释:“打通印度、西亚之希望在目前甚小”,故决定利用蒋对北缅增兵机会,以歼灭蒋军解决中国事变为宗旨。这也是日军长期来的极大愿望。其作战方式要求进行歼灭战与速决战,才能达到预想作战效果。东条首相在1月20日会议上特别强调:“进行缅甸作战,要避免同中国军队陷入胶着状态。”^③日军企图通过缅甸作战切断援蒋路线,歼灭在缅中国军队,故其对缅作战也可以说是对华作战的扩大,缅甸作战同日军的侵华战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日军1月30日攻占缅甸南方重要城市毛淡棉,迈出了对缅战争的重要一步。后因在菲律宾等地作战受挫,船舶征集困难,对缅甸的大规模进攻延滞于3月初才正式发动。此时中国远征军已大批入缅。日军判断此时在缅中英军队兵力已达八九万人,飞机约为100架。于是,日军较原计划增加2个师团,共投入主力师团4个约9.5万人,飞机约250架,以确保十二分的战胜把握。对于作战任务和作战形式,仍要求进行歼灭战:“如能痛歼蒋介石直系军队,则不仅能遮断既有之援蒋路线,敌所企图开通之新路线亦将为我控制,对于顿挫重庆方面的继续抗战意志将发挥重大作用”。^④

3月18日至30日,在中缅重镇同古(东瓜)等地,日军遭受中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325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327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325~326页。

④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25页。

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戴安澜部的顽强抗击。第五军及戴师曾参加昆仑关之战，取得挫败日军第五师团、击毙其第二十一旅团中村正雄少将的战绩。同古(东瓜)等地阻击战，是日军“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① 4月中旬，日军将英军第一师及坦克营等部7000余人包围在仁安羌以北地区达两昼夜，英军弹尽粮绝，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解救，毙日军1200余人，救出英军7000余人，传教士及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并将战利品汽车百余辆、马1000余匹移交英军，是为仁安羌大捷。但以上作战未能挫折日军的总体攻势。日军向缅甸陆续增兵，而中英军队组织分散，目标不一，英军的战略意图是弃守缅甸，故接战即撤。3月21日马格威空军基地被炸，英空军力量被摧毁，日军取得缅甸的制空权。中国远征军作战指挥方面也有严重失误，何应钦说远征军作战“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② 日军不但占领全部缅甸，还进入了云南西部地区，占拉孟、腾越等要地，隔怒江同中国军队对峙。中国的南方陆上运输线被日军完全切断，日军大体完成对缅作战计划。

日军占领缅甸之后分兵固守各要地，并筹谋扶植脱离英国的亲日政权，修建泰缅铁路，将缅甸建成南方战场的西部屏障，并使其成为进攻中国西南及印度的战略基地。中国远征军大部撤回云南休整。名将戴安澜负伤去世。退入印度的有第五军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等部，改称为“中国驻印军”。蒋介石还同意将远征军和驻印军划归史迪威统率，装备美械，重新整训。盟军不断对在缅日军进行空中攻击，并组织了对缅西阿恰布港的反攻。英军奥德·温盖特率领的特种部队多次进入日占区，炸毁桥梁、铁路，进行游击作战。1943年1月美英卡萨布兰卡会议与同年8月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11页。

②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193页。

美英魁北克会议,决定重新夺回缅甸,中国方面出自对交通线的关注,亦敦促盟军早日发动对缅大反攻。而英国受限于欧战,调集舰船用于英吉利海峡等多个方向,从陆海两方反攻的计划未能实施,盟军在缅甸的作战规模缩小。同年3月,中英军队由史迪威指挥,推进到缅印北部交界处利多,实施反攻。

日军对盟军在缅甸方面的作战十分紧张,1943年1月杉山总长表示担忧:“假如南方之一角发生崩溃,将产生巨大的恶劣影响。”日军统帅部定的指导方针是:“增强兵力以确保缅甸要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进攻印度东部要域,或借用敌之攻势并将其歼灭。”^①企图采



图38 中国远征军在滇西俘虏的日军慰安妇,有的已怀孕

取以攻助守的战略。3月27日,增兵后的在缅日军升编为缅甸方面军,任务是守护日军东南亚战场西翼之安全,防止盟军反攻,并为预期8月建立的缅甸国提供军事支持。方面军直辖第五十四、第五十五师团等部用于防备缅甸西部,方面军辖第十五军,下辖第十五、第十八、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第五十六等师团,配置于北缅,“专致于重要方面作战”,^②即对于云南及印度东部的中英军队作战。参谋总长杉山对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交代任务时强调:“缅甸为切断重庆政权与联合军方面联系的战略要地,不仅是进攻印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6,第88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6,第307页。

度的作战基地，还是防卫南方的锁钥。在战争指导上，是巩固大东亚之一环，必须绝对确保。”^① 缅甸方面军成立后，是为日本南方军内最大的陆军重兵集团，并继续增加军队，到 1945 年 5 月共有 9 个师团又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及航空兵部队等部。

尽管日军作出了巨大努力，其担心的缅甸这一“南方之一角发生崩溃”的局面还是迅速到来。1943 年 10 月，中国远征军及驻印军第二次入缅作战，先后收复滇西、北缅要地，翌年 8 月攻占密支那，11 月攻占八莫，日军第三十三师团遭受惨败。日军第十五军以攻为守发动英帕尔之战亦于同年 8 月溃败，第十五军第十八师团几被全歼，“失去了战斗力”。中印公路交通恢复。

中国军队抽转回国之后，英印军队继续在缅作战。1945 年 3 月伊洛瓦底之战，决定了日军在缅甸完全失败的命运，英军乘胜追击，日本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大将只身逃离仰光，整个缅甸战局崩溃。据日本战后调查，日军投入缅甸作战总兵力约 30.4 万人，战死 18.5 万人，最后归国 11.8 万人。^②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6，第 310 页。

② (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313 页。